



# 舒芜口述自传

舒芜 口述 许福芦 撰写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舒芜口述自传

舒芜 口述 许福芦 撰写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舒芜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066-8

I. ①舒… II. ①舒…②许… III. ①舒芜—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5945 号

责任编辑 徐广琴 周墨西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98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插页 18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66-8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写在《舒芜口述自传》再版之际

转眼间舒芜前辈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将近四年。我们共同跨着世纪门槛辛苦了差不多五年的这本《舒芜口述自传》就要再版，而且是由他曾痛痒相关、艰难厮守多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完成，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有理由替他高兴。

自然想起2001年6月，这本书最终脱稿的那天上午，舒芜前辈同我斟酌再三，嘱我在搁笔处写下一句话：“现在这个口述自传的编辑出版，是我再一次向历史把这一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并郑重以“责任无限，言语有限”八个字作结，之后又亲自校订的情形。还有初版期间的编辑过程中，个别敏感的细节表述与编辑商榷，前辈执意强调“宁可不出，也绝不更改一字，我对口述文字每一句话的事实负责……”时那果决的音貌。十多年过去，一切皆历历如昨。前辈对于我们这部口述成书的作品珍爱之情，还在温暖着我。

《舒芜口述自传》初版印出后，记得我们都发现某些章节的内容与结构设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相约再版时要做点调整，使之尽可能完美些。而如今我与前辈阴阳两隔，不能不心生感慨。作为撰稿人，我无权擅自对前辈的“口述”内容作任何调整，这只能成为遗憾。再版中，正文内容原则不动一字。忽然觉得，也许过于完美对于口述文本并不是件好事。还是坚持我初版时的想法，把周密

详考的工作放到后面去做,或许更为妥当。

诚如一位学人朋友所言,这部口述传记试图超越文学或思想创作,它还原的是历史,因而它不单单是个人的人生经验。然而它又确乎是个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脚印,个人的态度与表述方式,无论怎样都要在文字中留下鲜明的印记。这是口述文学的审美局限呢,还是独特的优势,我说不大清楚。

最后,我要和舒芜前辈的家人一起,代表前辈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真诚地道一声谢。以我们对老人家的了解,本书的这次再版,九泉之下他若有知,会感到由衷的欣慰。

许福芦

2013年7月31日

## 前 记

我哪是值得立传之人？哪有多少可以入传之事？这里却有了一本我的“口述自传”，岂不滑稽？

事情是这样来的：部队作家许福芦君，1997年才相识。他熟悉猛将雄关、金戈铁马的题材，不知为什么对我的蠹鱼事业、苜蓿生涯有了兴趣，要写我的传记。我惶谢再三，他坚持再四，比赛韧性。终于我比不过，找了些资料给他。他认真看过，还不远千里，从北京到我的故乡安徽桐城，找了我的故家和我的母校等地访问摄影。将动笔前，他要我先谈谈平生大概。我谈了一点。他一听，主张就这样详谈下去，由他记录出来，便是“口述自传”。我一向不懂，许多自传，也是本人口述，别人记录的，并不标明“口述”字样；那么，特别标明“口述”的自传，究竟有什么不同？福芦作了许多解释，我还是不明白。好在只要我动动口，想来不会太费事，也就不求甚解地“口述”起来。我们从1998年开始，一章一章地进行，每一章至少都经过六个步骤：我口述录音；他写出初稿；我加工调整；他打印出清稿；我再作修补；他打印出定稿。共得十三章，算是完成，已经到了2001年，前后跨越三年。中间我因病因事，多有耽搁，拖泥带水地进行之中，更见出福芦的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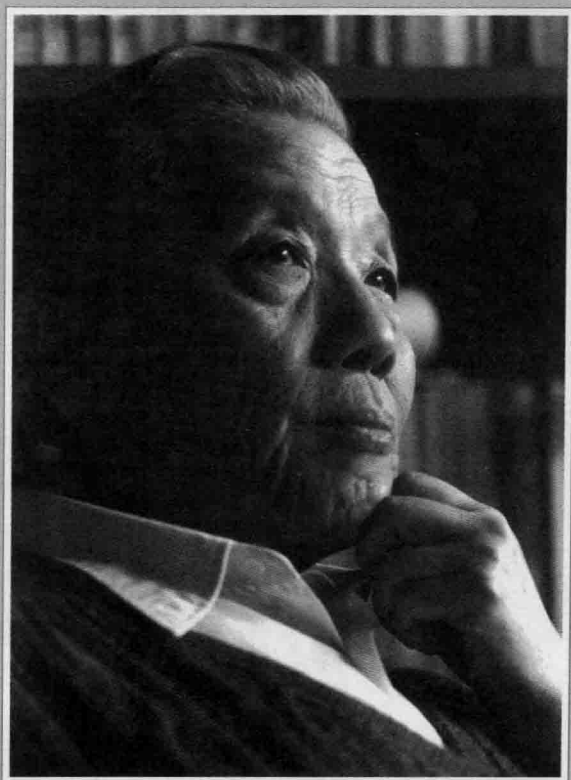
本来，我平生经历中稍稍有点意思的，大概都写过回忆文章了，这里实在没有多少新材料。于是以意为之地发挥“口述”二字

的特点，散漫谈之，随时泛涉到有关的环境气氛、交游人事等等。福芦生于五十年代，听我这个二十年代生的人谈这些旧事，倒觉得新鲜，鼓励我就这样谈下来。

这部平凡贫乏的自传，对读者只有一个意义，就是看一个人是如何虚度一生的。我那些回忆文章将另有结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舒芜集》第八卷），本书读者会不会看到，有没有兴趣参看，都难以预料。我只声明一点：如果遇到，请参看那里面的一篇《〈回归五四〉后序》（当然先已收入论文集《回归五四》），是关于我虚度一生的思想历程的最完整的总结。凡是此传未说到未说清，而那篇说到说清了的，全以那篇为准。

这三四年中，福芦为此传花了大量时间精力。他的记录，在漫谈文体中尽量暗寓条理，在书面语言中尽量口语化，煞费经营。全书章节的分合与标题，都是他的主意。注释全是他加的。他的夫人汪晓莉女士始终协助，一次再次地打印；我的字十分拙劣潦草，她要很费大力来辨认。对他们两位，我要郑重致谢。绛云女士热心促成此传出版，我也深深感谢。

2001年5月13日，舒芜记。



1988年的舒芜





舒芜夜读



2001年舒芜(左)携外孙女杨章章(右)与许福芦合影

# 目 录

前 记	1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1
第二章 从小课堂到大课堂	32
第三章 离乱中的青春	58
第四章 南温泉、白苍山	108
第五章 劫后河山	162
第六章 在黎明前	190
第七章 解放了	214
第八章 平静的日子不平静	251
第九章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	288
第十章 狱里狱外	298
第十一章 深渊	319
第十二章 向阳湖畔	335
第十三章 北京的金秋	359
附 录 舒芜年表	380
后 记	387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我是安徽桐城人，姓方。人家一听，总说：“桐城方！名门。”其实，我家从祖父以下四房人在一起，一共大约几十间房屋，乡下还有几十亩水田，在桐城名门中要算最清寒的一家，平常日子还得节俭着过。

我的祖先原本不住在城里，是住在桐城乡下鲁砬山。“砬”是大壑的意思，古书上常常用来给山川命名。所以，鲁砬山就是我们桐城县的一个山区地名。解放后为了简便起见，一般就用同音字“洪”来代替，叫“鲁洪山”。

据说，我的祖先在鲁洪山地区以打猎为生，因而当地人又称我们是“猎户方”。这在旧社会显然有点看不起的味道，所以只是背地叫。当了面，就称我们“鲁洪方”，也叫“小方”。

所谓“小方”，是相对于另一家同姓不同宗的“大方”而言。“大方”住在县城，是“县里方”，也叫“桂林方”。那才是真正的桐城望族。

“桂林方”与广西的那个桂林并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从成语“桂林一枝”得名的。明末清初，我们桐城出的一系列姓方的名人，都是“桂林方”。比方说一代思想学术大师方以智，又比方说桐城派古文创始人方苞，等等。以前老是有人把我当成方苞的后人，其实不是。为这个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非方苞之

后》<sup>①</sup>，那里面作了详细说明，这里不多解释。

总之，我的祖先大概就是聚居在山野的一般平民百姓。说到这一点我很惭愧，多少年来始终没有机会去鲁洪山看看，只晓得我们“鲁洪方”宗族的享堂一直在那地方，不像桐城那些大姓，都把祠堂建到县城里，像“桂林方”的方氏宗祠就很堂皇。我们连“祠堂”也没有，只有“享堂”，而且还在乡下。可见我们是个小姓，过去讲起来好像还有点掉面子。

在清朝乾隆以前，桐城大小知名人士，姓方的里面没有一个是我们“鲁洪方”。后来到道光年间，出了个方东树<sup>②</sup>，算是我们“鲁洪方”头一个在全国挂号的人。他是姚鼐的学生，是“姚门四弟子”之一。要讲辈分，离我不远，与我的曾祖父同辈，但年龄比曾祖父大得多。我的曾祖父是他的远房弟弟，同时又是他的学生。

方东树在当时严格说起来，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名气。他一生著了很多书。比较引人注目一点的，恐怕就是《汉学商兑》和《书林扬觝》。《汉学商兑》竭力张扬宋学，攻击汉学，学术上并没有多少价值，但是倒可以作为清朝汉学与宋学之争的一份重要材料。方东树还有一本书，叫《昭昧詹言》，可以代表桐城派的诗论。科举时代士子都要作试帖诗<sup>③</sup>，所以这本书有实用价值，因此也就相当流行。现在回头看清代的文学批评史，《昭昧詹言》还有它的一席之地。

我们“鲁洪方”第二个有些名气的人，就是我的曾祖父方宗诚。他字存之，号柏堂，师从方东树，也可以说是姚鼐的再传弟子。

我的曾祖父年轻时家里很穷，只是乡下的一个贫寒书生。但他跟后来成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纶关系不错。吴是我们的同乡，也是寒门出身，清同治三年中的举人，第二年又中了进士，授内阁中书，很得曾国藩的赏识，就被曾留在他的幕府切磋学问。

不知是不是由于吴汝纶的举荐,我的曾祖父后来也随吴成了“曾幕”人物<sup>④</sup>。

当然,“曾幕”人物有大也有小。李鸿章那么大的牌子,当年也是“曾幕”人物。我的曾祖父地位肯定没那么高,官也只做到一个小小的直隶枣强县知县,就在今天的河北省枣强县。他在那里当了七年县令,官职虽不大,却把学问做大了,成了全国知名的理学家,晚年与朱次琦、陈澧等人同受清廷的“五品卿”封衔。

我的曾祖父就是这样由“曾幕”起家的。他在为人治学方面,也很受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虽然不是我们安徽人,可对桐城派的“中兴”却有很大功劳。吴汝纶出自曾门,当时号称是桐城派的殿军大师。吴对我的曾祖父极为欣赏。清朝末年他奉派到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大发感慨,说人家日本都有人讲“柏堂学”,可叹我们自己倒没有人讲。他没有详细说出事实根据,也没有听到别人说过,但是这话在我的家乡流传很广,桐城人引以为荣。我们家族的人、特别是我的祖父,更觉得非常自豪。

我祖父对我的曾祖父是极为尊敬的,经常给我们讲他老人家如何如何了不起。我祖父是个诗人,又是本地知名的书法家,在他的一大堆图章里面,最常用的那枚印章,上面是六个字:“方氏柏堂季子”。可见他很以自己是曾祖父的儿子为荣耀。

那时候,我们家每年的正月初七,祖父都要像模像样地主持一个典礼,祭奠圣人。这个仪式极其肃穆,堂上要张挂历代圣哲的画像,正中一排主要受祭的圣贤,从孔孟开始,中间有哪些人物我记不清了,但最末一位永远忘不了,他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曾文正公曾国藩。至于自伏董马郑以至顾黄王<sup>⑤</sup>等学者和屈宋马班李杜韩柳<sup>⑥</sup>等文士,都只能分列左右两旁。

我们一般堂兄弟姐妹,从小都被圈在大家庭里生活,排行也是

按照大家庭的年龄顺序来。我们直接受祖父的教育很多，自然而然也觉得有这样一位曾祖父，真是很大的骄傲。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将来长大以后，要像曾祖父那样，当个有名的理学家。其实，现在看来，清朝一代，理学成就并不高，我的曾祖父在清朝的理学家里面，又远远不是第一流的。

曾祖父的著作倒是不少。有一套《柏堂遗书》，装满一个小书箱。记得我最初就是从里面抽出一本《俟命录》，读得津津有味。这是一本笔记，过去的理学家都喜欢写这种随笔似的东西，谈理学见解。那时我抱起这个东西来读，还很有点吃力，半懂不懂的，啃了很长时间，最后也没有读完，但由此却对理学真的产生了一点兴趣。于是，从那以后到处找理学书和一些“学案”之类来看。虽说是胡乱地翻看一气，倒也多少学到几个术语，像“天理人欲”、“人心道心”，像“研几格物”、“主敬存诚”等等，还晓得了有所谓“濂洛关闽<sup>⑦</sup>之传”、“朱陆异同之辩”<sup>⑧</sup>。

这么一来，我也耐不住了，想动手写点理学家式的笔记。先拿出架式，要标举一个什么字，以显示自成一家的决心。标举一个什么字呢？想来想去想出一个“诚”字，可又觉得犯了曾祖父的名讳，不大合适。请教别人，也都说不行，我就只好放下这个“诚”字，再慢慢想，后来一直也没有想出来。

现在看来简直是儿戏，可在那时，我是极真诚的。我年年跟着祖父给曾国藩叩拜，在学习理学过程中，《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也是常备常读，而且还遵照祖上的家训，躬行实践，希圣希贤，很严格地修养自己，甚至还打算也制定一个“功过格”，每天自我检查，言行善恶、功过是非一一在案，以警策自己，连“善念”、“恶念”都不放过，有点“狠斗私字一闪念”味道，真够单纯的。那时我崇拜没有见过面的曾祖父，也崇拜天天见面的祖父，还崇拜从小就知道是大大有名的外祖父，这三位前辈可以说是我小时候的精神

偶像。

我的外祖父马其昶，字通伯，在文章学问上的名气，清末和民初不论京城还是地方，都是叫得响的。他出身翰墨世家，明代的太仆马孟祯，清代汉学家马宗琬、马瑞辰等人，都是外祖父的祖先。到他这一辈，一直都很努力，在我的曾祖父方宗诚和吴汝纶门下求学，并且经吴汝纶介绍，到武昌求教于张裕钊。所以，早年的学问底子打得很扎实。

外祖父开始出名，是他三十一岁那年著了一部《桐城耆旧传》<sup>⑨</sup>，接着就开始讲授经学，先到安庆藩司署讲，后来讲到庐江的潜川书院，最后讲到合肥的李鹤章<sup>⑩</sup>家，名气越讲越大。他还协助吴汝纶办教育，曾经出任过桐城中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光绪三十四年，朝廷诏举人才，安徽巡抚冯煦第一个就推举我的外祖父。就这样，他进京当了个学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教习。

我的外祖父是桐城派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很有影响。他在北大教古典文学，是所谓“旧派人物”。那是民国初年，严复当北大校长。后来蔡元培继任校长，大力改革，旧派人物许多都退出北大。到了袁世凯解散议会，实行专制，以御用的小参政院作点缀，拼命拉拢名流，我的外祖父也被拉进参政院，当了一名“参政”，这一点很被当时人不满。但是，袁世凯进一步要做皇帝，也有人来拉拢我的外祖父参加“劝进”活动，他还是坚决回绝了，理由是“区区非能事二姓者也”。于是他收拾行李回桐城老家。

1916年，也就是民国五年，我的外祖父又回北京。这一次是去应聘，当清史馆的总纂。大概他觉得在民国的机构里工作不属于“事二姓”吧，而且，旧朝遗民在新朝参加为旧朝修史，向来不算失节，于是，接受下来了。这个“总纂”并不是“总编辑”，一个清史馆

里面有好几个“总纂”并列,大约近似于现在的几个编辑室主任罢了。

不管怎么讲,已经到了民国,外祖父作为一个“旧派人物”,在北京这个文化圈里,还是不太顺心的。比方说我的父母在北京举办新式结婚典礼,他就来了一家伙,差点弄得大家不开心。

这件事说起来还是由陈独秀和胡适引起的。陈和胡那时都是大名鼎鼎的“新派人物”。胡适是安徽绩溪人;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与我们桐城紧靠在一起,陈家同我们方家又是世交,陈独秀的父亲与我祖父这一辈交往,而陈独秀本人则与我的伯父、父亲来往。

在我外祖父面前,陈独秀和胡适当然是同乡小辈。陈不用讲了,他的父亲同我外祖父也都有交情;胡适是皖南人,相距都不远。但是,陈和胡坚持的那套新的东西,我外祖父是肯定不以为然的。所以,听说我父母婚礼仪式的来宾中,有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个人,外祖父就坚决不出席。

这一下可麻烦了,我外祖父是女方家长呀,他不出席怎么行!没有办法,事到临头,只好让我的一个舅父作代表,出席我父母的婚礼。这个舅舅是我母亲的弟弟。让他担任女方家长的代表,实在是迫不得已,很不像样子。可见,那时新旧两派的对立还是蛮尖锐的。

但是,前些时候我偶尔在《胡适书信集》中看到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信,很有意思。当时陈独秀在北京因为散发传单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京城内外形成一个“救陈事件”,轰动一时。其间,我的外祖父也参加了救陈的活动,还出席了陈独秀出狱时的答谢宴会。这一点,体现出外祖父与陈家的道义之交,也看出我的外祖父对陈独秀其人的复杂感情。所以,胡适后来还专门向陈独秀提到这件事。



陈独秀一贯赞成激烈的行动。当时,北京有个《晨报》,很右,群众愤激之下,把报馆给烧了。陈独秀认为该烧,而胡适则说不应该烧,两人意见相左。因而胡适就批评陈独秀,说,你还记不记得呀,你被捕的时候,在救援你的人里面,还有桐城马通伯、姚叔节这样两位老先生哩。你出狱后的那个答谢宴会,人家也都来了,你看人家的胸量,我们应当学学这种风度嘛。

外祖父大约是1928年左右离开北京回桐城的,1930年就去世了。他离开北京时,南京政府已经成立,北京已经不是首都,北洋政府已经不存在,清史馆这类的机构随之不存在,外祖父当然无须再留在北京了。他一走,他的一些儿女,原先直接间接以他为中心而在北京的,都纷纷南下。我母亲也在这时带着我和别的几家亲戚结伴回到了安徽桐城老家。可是,我的父亲却没有一同回去。

我父亲方时乔,字孝岳,后来孝岳成了通用的名字,这叫做“以字行”。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1897年生。父亲小时候在家塾读书,后来又 到安庆进六邑中学。没读多长时间,就考到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当时很有名气。我父亲在那里读完中学,又接着考上了大学,一直没离开圣约翰大学。他那时盯着这所教会学校的目的,就是想将来能去英国留学。圣约翰大学的主要优势就是外文教育很严格,因而从那里毕业,考去英国留学很可能方便一些。现在人们讲究去美国留学,看得很重,而那时最时兴的是去英国留学,认为留学只有到英国,才算是正宗出洋,是最高级的。

我父亲在圣约翰大学文科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当了一段时间的预科国文讲师。北大曾经送预科国文讲师刘复,也就是刘半农去法国留学,我父亲去北大,也希望能得到类似的机会,后来不知